

# 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及其历史意义<sup>\*</sup>

黄 明 喜

(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, 广州 510631)

**摘 要:**通过对《陆九渊集》的分析讨论,可从学理层面上厘清陆九渊“易简”教学法的理论依据。结合对发明本心、优游读书与六经注我诸命题的阐释,可揭示“易简”教学法的涵义:强调随机启悟,教导受教育者自己向内心去体认“本心”,以端正做人的动机,从而认知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有所得;要求教育者主动宣讲教化,论事析理,以情动人,鞭策鼓励受教育者明辨义利,立定志向。在读书理论上,陆九渊主张平淡简易、优游厌饫;在治学立场上陆九渊则主张学者应善于利用儒家经书里的思想智慧,以张扬自己当下的生命意义。“易简”教学法是陆九渊心学教育区别于朱熹理学教育的一大标识,对中国教育史上宋明心学教育学派的产生具有开创意义。

**关键词:**陆九渊;“易简”教学法;发明本心;优游读书;六经注我

重视教育,是孔孟以来的历代儒家代表人物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。作为宋明心学开山祖师的陆九渊循沿这一传统,远绍孔孟,充分挖掘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特别是《周易》等儒家经典的教育智慧以推陈出新,从而使其心学教育思想别开生面,迥异于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。其新,即在陆九渊把儒家伦理与心合二为一,并将心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哲学高度,主张“发明本心”,强调“优游读书”和“六经注我”,创造出一套简易而有效的涵养方法与认知方法。陆九渊独放异彩的“易简”教学法拉开了宋明心学的帷幕,开创了一股清新的教育学术之风。诚如心学教育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所言:“象山之学简易直截,孟子之后一人。其学问思辨、致知格物之说,虽亦未免沿袭之累,然其大本大原,断非余子所及也。执事素能深信其学,此亦不可不察。”(王守仁,1992)王阳明高度肯定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,认为陆九渊是“孟子之后一人”,但遗憾的是,王阳明并没有进一步揭示陆九渊“易简”教学法的内涵及其表征,后世学者也多语焉不详。笔者认为,从学理层面上讲明陆九渊“易简”教学法的理论依据,并结合对“发明本心”、“优游读书”与“六经注我”诸命题的阐释,进而探讨其“易简”教学法的要义,可以丰富我们对儒家教育智慧的认识,也可以从中吸取有价值的资源养分,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。

## 一、“心即理”：“易简”教学法的本体依据

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与其心本论是紧紧相连的。要明乎陆九渊“易简”教学法的涵义,首先必须了解其“心即理”的本体论主张。否则,也无法深入理解陆九渊“易简”教学法的合理性思想。

从本体论层面来看,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是建立在“心即理”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。正是由于本体论的差异,才致使陆九渊在道德教育的路径和方法上与朱熹分道扬镳。朱熹在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时,强调主体服从本体,认为主体(“心”)是由本体(“理”、“道”)产生的,“心”(主体)具有“理”,但“心”本身则有别于“理”,“理”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绝对观念。陆九渊则强调主体与本体的合二为一,本体服从主体,把本体(“理”)安置在主体(“心”)之中,从而提出与朱熹以“理”为哲学最高

<sup>\*</sup> 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课题“宋明至民国‘四书’主体教育形态嬗变研究”(10YJA880046)。

范畴相对的以“心”为最高范畴的主张(张立文,1992)。陆九渊基于“心即理”的本体论立场,极为重视“心”的作用,倡言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(《陆九渊集·年谱》)。在陆九渊那里,“心”的主要含义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和认识能力,“理”的主要含义是指天地万物存在的法则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原则。“心即理”之“即”则表示“心”与“理”两者水乳交融,相互依存。陆九渊强调:

盖心,一心也;理,一理也。至当归一,精义无二,此心此理,实不容有二。……仁,即此心也,此理也。(《陆九渊集·与曾宅之》)

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。”四端者,即此心也;天之所以与我者,即此心也。人皆有是心,心皆具是理,心即理也,故曰“理义之悦我心,犹刍豢之悦我口”。所贵乎学者,为其欲穷此理,尽此心也。(《陆九渊集·与李宰二》)

这两段话的意思是,“心”非别物,就是“理”,“理”无二样,故而“心”只有一个。而“心”又该怎样来把握呢?他这样说道:“心只是一个心,某之心,吾友之心,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,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,其心亦只如此,心之体甚大,若能尽我之心,便与天同。为学只是理会此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下》)陆九渊认为学者要把握“心”就得做到内心的充盈和自信,消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膜。在陆九渊看来,一切学习的根本就是为了理会“心”,把所学到的知识化为德性,使得学习者自己成就一个圣贤般的理想人格,挺立于天地之间。

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,“心”是至善完满的绝对存在,而且世间万理都在人“心”之中。在陆九渊看来,人们大可不必注重外在事物的穷理致知,只要从本有的至善之“心”开始下功夫,依照自己的“本心”而行动,那么所有的言行举止就会恰到好处。陆九渊整个心学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“心即理”这一本体基础之上的,因此形而上的“心”就成了其心学教育的本体论基础。

## 二、“易简”与“发明本心”

陆九渊“心即理”的本体论落实在教育层面上所凝结出的一个富有张力的思想命题,就是他著名的“发明本心”说。陆九渊用“易简”这一范畴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(顾春,2003)。

陆九渊认同孟子“尽心知性”、“善养吾心”的教育主张,认为道德培养并非单纯的知识问题,而更主要是一个化繁为简的道德教育问题。他认为一旦人体认出其内心所固有的道德本体,自可成为一个道德之人:

孟子曰“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。”“此天之所与我者,我固有之,非由外烁我也。”故曰“万物皆备于我矣,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”。此吾之本心也。(《陆九渊集·与曾宅之》)

仁义者,人之本心也。孟子曰“存乎人者,岂无仁义之心哉”,又曰“我固有之,非由外烁我也”,愚不肖者不及焉,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。贤者智者过之,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。(《陆九渊集·与赵监》)

“本心”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,是不虑而知、不学而能的良心。人的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根源于“失其本心”,因而一切为学工夫都应围绕着保持“本心”来展开。陆九渊反复强调:“先王之时,庠序之教,抑申斯义以致其知,使不失其本心而已。尧舜之道不过如此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贵溪重修县学记》)“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,不失其本心而已。”(《陆九渊集·敬斋记》)所以,当有学生提问时,陆九渊径直把“四端”视作“本心”。

究竟怎样“发明本心”?陆九渊认为,可以向冠居儒家群经之首的《周易》借智慧。《周易》认为宇宙运行存在着生的趋势,万物皆有生生之理,此生生之理所蕴含的最高之德便是“易简”。正因为平易而不繁杂,才容易被人了解;正因为简略而不繁杂,才容易使人遵从。容易被人了解就能获得别人的亲近,容易使人遵从就能获得别人的支持。《周易·系辞》曾曰:“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;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。”根据其中的“易简”观念,陆九渊形成了颇有特色的“易简”教学法。他说:

学无二事,无二道,根本苟立,保养不替,自然日新。所谓可久可大者,不出易简而已。(《陆九渊集·与高应朝》)

正理在人心,乃所谓固有。易而易知,简而易从,初非甚高难行之事。(《陆九渊集·与李宰二》)

陆九渊认为自己的“易简”之法与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之法相比,要来得简易直截。总括而言,陆九渊倡导的“易简”教学法大致有两方面的含义:强调“先立乎其大”,从日常生活入手,着眼于当前事务的道理,随机启悟,教导受教育者自己向内心去体认“本心”,以端正做人的动机,从而认知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有所得;侧重于“多就血脉上感动”,要求教育者主动宣讲教化,论事析理,以情动人,鞭策鼓励受教育者明辨义利,立定志向。

陆九渊十分重视“易简”这种教学法。他一生钟情教育,培养了不少学有成就的学者。他的“发明本心”说以“甬上四学者”(杨简、袁燮、舒璘、沈焕)最得其真传。这里不妨以杨简为例,一窥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之法。在《陆九渊集》的年谱里,载有一则陆九渊成功使用“易简”教学法来回答杨简如何“发明本心”问题的教学案例:

(杨简)问:“如何是本心?”先生曰:“恻隐,仁之端也;羞恶,义之端也;辞让,礼之端也;是非,智之端也。此即是本心。”对曰:“简儿时已晓得,毕竟如何是本心?”凡数问,先生终不易其说。(《陆九渊集·年谱》)

这则对话发生在乾道八年(1172年)。这一年,34岁的陆九渊声名鹊起,经常应酬问答,大受欢迎。阳春三月,陆九渊路经浙江境内,时任富阳主簿的杨简当面向陆九渊请教“如何是本心”?陆九渊的答案简洁干脆:“恻隐,仁之端也;羞恶,义之端也;辞让,礼之端也;是非,智之端也。此即是本心。”对于陆九渊所给出的点拨性回答,杨简感到难以释怀。儒家的仁义礼智究竟为什么是“本心”?按照常理来说,思想睿智的陆九渊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难,但他并未给出过多的解释,弄得杨简一时也搞不明白“如何是本心”?不久,杨简遇到一桩官司,就一下子觉悟出“如何是本心”:

先生曰:“闻适来断扇讼,是者知其为是,非者知其为非,此即敬仲本心。”敬仲忽大觉,始北面纳弟子礼。故敬仲每云:“简发本心之问,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,简忽省此心之无始末,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。”先生尝语人曰:“敬仲可谓一日千里。”(《陆九渊集·年谱》)

仁义礼智即觉,觉即仁义礼智,人皆有此心,理为人心中之理。杨简经陆九渊借“断扇讼”一事当机启悟的点教,省悟到此心“无始末”、此心“无所不通”的境界,就是陆九渊所说的“易简”教学方法的一个具体运用。杨简在接受陆九渊的“本心”之说以后,有一个将对“本心”的体验与自己对宇宙本体的体悟相结合的过程(刘宗贤,1997)。杨简成名之后曾回忆说:“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,言中其情,或至汗下。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,为之条析其故,悉如其心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象山先生行状》)从杨简的描述中,我们可以想见陆九渊平日里当机启悟的“易简”的教学要略。

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倾向于教法的针对性、灵活性,强调当下启发学者,认为随机点拨可促发学者内心自悟。“近有议吾者云:‘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,全无伎俩。’吾闻之曰:‘诚然。’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“大者”,即“本心”。“先立乎其大者”,就是能识学者心术之微,当机启悟,让受教育者收拾精神、自作主宰。所以,陆九渊认为“先立乎其大者”的方法,与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相比较,实在是简易、直截、易行:“吾之言道,坦然明白,全无粘牙嚼舌处,此所以易知易行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不仅陆九渊自鸣得意,连他的学生也感佩不已。一个名叫毛刚伯的学生这样评价道:

先生之讲学也,先欲复本心,以为主宰;既得其本心,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,读书考古,不过欲明此理,尽此心耳,其教人为学,端绪在此,故闻者感动。(《陆九渊集·年谱》)

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之法不单单重视“先立乎其大者”,强调引导受教育者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,而且主张多就血脉上教育感化学生。陆九渊不无自豪地说:“吾与人言,多就血脉上感动他,故人之听之者易。”(《陆九渊集·年谱》)所谓“血脉”,主要是指入德和为学上的关键处。翻阅《陆九渊集》以及梳理

朱熹与陆九渊的教育学术交往,可以看到不管是讲论入德之方还是为学之门,陆九渊总能引起学生的兴趣,调动学生的兴奋之情。诚如教育史家陈青之所指出的那样,陆九渊“这种教法,有精神,有血气,不是呆板形式地五段、三段可比;所以每到一处,学生归心求教之多,如云腾雨集。这种讲说的魔力,与法国卢梭相等,但他庄重不苟的态度,又非卢氏之浪漫可比。”(陈青之,2009)

陆九渊的确能言善讲,并能够把握教学的精神要害,进而打动学生的思想情感。《陆九渊集》有一则他的两位弟子傅子渊和陈正己的学习对话。陈正己问:“陆先生教人何先?”傅子渊答:“辨志”。陈正己再问:“何辨?”傅子渊毫不迟疑地应答:“义利之辨”。陆九渊听完弟子的对话,当机点教予以评价:“若子渊之对,可谓切要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

从教育学的范畴来看,“志”主要涉及意识的动机。基于心学教育的立场,陆九渊认为判断行为是否有道德价值,关键取决于行为赖以产生的动机,即意识所依据的原则。所谓“辨志”,就是要辨明意识活动的动机是由什么原则来决定的。其实,陆九渊常讲的“辨志”,即是辨义利之志。孔孟以来的儒家教育向来十分重视义利之辨,譬如主张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主张人必须以“义”来立志,即以“义”作为支配行为的原则。受孔孟教育思想的影响,陆九渊常说义利之辨乃入德为人之第一义。

与陆九渊一样,朱熹也把“义利之辨”视为儒门之教的要义。朱熹曾特意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,专门为学生讲解《论语》关于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一章。陆九渊论事析理,感情充沛,使听者深受感动,以致有的人流涕连连。此时适逢早春,竟然也使朱熹感动得汗出摇扇。讲授完毕之后,朱熹深有感触地说:“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。……凡我同志,于此反身而深察之,则庶乎其可不迷于入德之方矣。”(《陆九渊集·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》)朱熹恳请陆九渊书之于简,并将讲演内容编成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》。显然,朱熹也认同将讲明“义利之辨”作为“入德之方”的“易简”教学法。

陆九渊随时随地用“易简”教学法去引导弟子“发明本心”,以免产生支离的弊病。陆九渊曾在鹅湖之会上赋诗曰:“易简工夫终久大,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”(《陆九渊集·鹅湖和教授兄韵》)他讥讽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教学法是“支离”事业,前途艰难,而坚称自己的“易简”教学法,不仅可久可大,而且易知易行。在陆九渊的眼里,知识并非道德实践的必要条件,一个人只要能发现并彰明扩充善养之“本心”,即使大字不识一个,也能堂堂做一个人。他认为按照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教学法进行教学,学生获得的大多是关于圣贤言语的支离破碎的知识,在道德实践上无甚益处。也正是基于教学法层面的分野,“易简”和“支离”遂成为判别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教育学派差异的一大标识。

### 三、“易简”与“优游读书”、“六经注我”

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,怎样读书和如何诠释儒家经典是两个相互有别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。就承担主体来说,读者和释经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读者可以仅止步于阅读,而不必把读书心得表诸文字。但释经者总是把阅读经典的心得写成注疏、考证、义理阐释等不同形态的文本。无论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场还是基于学者的立场,如何思考阅读与诠释儒家经典都是陆九渊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陆九渊说:“所谓读书,须当明物理,揣事情,论事势。且如读史,须看他所以成,所以败,所以是,所以非处。优游涵泳,久自得力。若如此读得三五卷,胜看三万卷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下》)另据陆九渊的年谱记载:“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,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,此颇不合。”(《陆九渊集·年谱》)这基本上概括出了陆九渊和朱熹两人不同的读书法。朱熹主张泛观博览,吃紧用力,是沉潜的;而陆九渊主张深思精读,优游厌饫,是易简的。恰如陆九渊自己所言:“读书不苟简,外视虽若闲暇,而实勤于考索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象山先生行状》)

具体说来,陆九渊所谓的“易简”读书法,含义有二:一是平淡;二是简易。

在陆九渊的眼里,平淡是深奥的反面,圣贤之书千言万语莫非出入于百姓日常生活,通过平凡之事讲明朴素之理。读书人若能用平淡的心情,去阅读前辈先哲的书籍,并在日用生活上加以体察,仔细品味,切己致思,自然便胸有所得。陆九渊说:“读书之法,须是平平淡淡去看,仔细玩味,不可草草。所谓

优而柔之,厌而饫之,自然有涣然冰释、怡然理顺底道理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下》)

陆九渊认为,读书除了要持一颗平淡之心,还要懂得先易后难这一简单的道理。他说:“易简之善,有亲有功,可久可大,苟不懈怠废放,固当日新其德,日遂和平之乐,无复艰屯之意。”(《陆九渊集·与杨敬仲二》)意思是讲,当事物刚刚萌生,出现《周易》里面的第三卦“屯卦”所讲的艰难状态时,一切尚未明了,学者就该找准立足点,打好基础,这样才能由浅入深不断趋近圣贤的为学之境。读书亦当如此。简易为繁难的对立面,《周易》的精妙之处即是“简易”二字:“圣人赞《易》,却只是个‘简易’字了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《周易》“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”的原理,落实到所有书籍阅读活动上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。不从简易上下功夫,而着意于繁难之处,则会背离前人著书立说的本意。愈艰愈难,晦涩莫名,这在陆九渊的眼中根本不是读书的良法。对陆九渊而言,读书得根据自己真实的学识水平,从“易晓”到“难晓”。即先从容易的入手,碰到艰难晦涩的问题,不要苦思冥想,权且放置一旁,先读别的容易之处,在“易晓”处认真玩味,沉涵熟复,而后融会贯通,学以致用,肯定能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,这样之前的“难晓”处便会迎刃而解,释然于怀。“学者读书,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,切己致思,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。若先看难晓处,终不能达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

陆九渊的读书理论主张平淡简易、优游厌饫,强调不要看得太难太远,特别是不要用心太紧,这与朱子读书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其实,陆九渊和朱熹的读书法各有其所见和所蔽。朱熹一生勤于读书,著作等身。朱熹将读书、义理和训诂冶于一炉,所撰写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标志着宋元明清“四书”主体教育形态的开启。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元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,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陆九渊认为朱熹的读书法过于“支离”,与此相关,他也反对朱熹的为学观(尤其是在如何诠释儒家经典问题上)。

在陆九渊看来,相形于“发明本心”,治经和读书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。他十分厌恶训诂考证、笺注义疏体式的治经风气:“或问先生为何不著书?对曰:‘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。’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“尝闻或谓陆先生云:‘胡不注六经?’先生云:‘六经当注我,我何注六经。’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按照陆九渊的理解,所谓“我注六经”就是要求学者尽量理解儒家六经文句的含义,并参照别的典籍所提供的知识来注解经书,力求追寻经书的初始意义;而“六经注我”则是要求学者利用六经所蕴含的哲理来诠释自己的思想,哪怕是采用主观主义、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诠释研究和著书立说。陆九渊极力主张学者应善于利用儒家经书里的思想智慧,以张扬自己的当下生命意义。所以陆九渊才强调说:“六经当注我,我何注六经。”陆九渊认为,一个学者是否著书立说,在教育本质和目的上是一个无涉于价值判断的问题。儒家经书只是“发明本心”的载体。不管人世间有没有出现一个朱熹或者陆九渊,还是多出一部书或者少写一部书,于儒家六经所载的道理都无任何加损。陆九渊的学生包敏道始终未明乃师的思想要义,所以陆九渊耳提面命,严肃地批评包敏道没有长进:

一夕步月,喟然而叹。包敏道侍,问曰:“先生何叹?”曰:“朱元晦泰山乔岳,可惜学不见道,枉费精神,遂自担阁,奈何?”包曰:“势既如此,莫若各自著书,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。”忽正色厉声曰:“敏道!敏道!恁地没长进,乃作这般见解。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,便添得些子?无了后,便减得些子?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

由于陆九渊经常强调“发明本心”、“先立乎其大者”,这就使得一些理学学者和初入陆九渊门下的弟子产生了一种印象,以为他不重视读书。对此,陆九渊加以反驳:“何尝不读书来?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下》)

实际上,陆九渊还是比较强调读书的重要作用的,只是他的读书法与朱熹的有所不同。陆九渊认为读书固当明白文义,但更主要的是要得其精神要义:“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,然只以晓文义为是,只是儿童之学,须看意旨所在。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下》)由此,陆九渊进而提出“减担”的教育主张,即不希望人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全耗于书本之上。陆九渊这种有所收、有所放的“优游涵泳”的读书法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从陆九渊心学教育思想的本质上来讲,“六经注我”的治学主张和“优游涵泳”的读书观,充分折射出其心学教育的价值立场。

#### 四、陆九渊“易简”教学法的历史意义

历史地看,陆九渊和朱熹是南宋两大教育流派的主要代表,他们的分歧与争鸣,一直牵引着其后理学和心学教育的发展方向。

从教育哲学的视角而论,“发明本心”关涉的是德育论领域的问题,“优游读书”和“六经注我”关涉的则是知识论领域的问题。在陆九渊的心学教育思想里,“易简”教学法始终关联着这些命题。笔者以为,陆九渊在继承《周易》的“变易”、“不易”、“易简”以及先秦儒家教育精神的基础上,创造性地使用“易简”这一教学法,并赋予其两点新的意蕴:

(一)整体明了。陆九渊的“易简”工夫强调把教学过程视作一个直接把握事物整体的彻悟过程,反对支离片面地抓住个别环节去研究儒家典籍和读书讲学。他主张用整体思维的方式去激发学生的灵感,使学生产生大跨度的认识飞跃,让他们头脑中原有的零散想法立即变成对问题的总体认识。但这种顿悟式的思维方式,难以给学生提供精确的解释,也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非逻辑的思维倾向。

(二)减担。陆九渊有时把自己的“易简”教学法称做“减担”。他不赞成程朱理学的孜孜矻矻终日读经,也不赞成读那么多的经传注疏,认为读得愈多,精神负担越重,反而为“发明本心”增添了诸多障碍。因此,陆九渊要求学者得学会减负的方法。他说:

某读书只看古注,圣人之言自明白。且如‘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’,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,出便弟,何须得传注。学者疲精神于此,是以担子越重。到某这里,只是与他减担。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下》)

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,自家只是减他底,此所以不同。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

而朱子为学在教学法上不是减,却只是“添”。“因说定夫旧习未易消,若一处消了,百处尽可消。予谓晦庵事为他消不得。先生曰:‘不可将此相比,他是添。’”(《陆九渊集·语录上》)通过一番“减损”的工夫,将蒙蔽在人们心上有害于天理的东西除掉,充分展现内在的善性,这样便可达成学以做人的教育目的。所以,陆九渊主张教育的工夫不要一味地叠加甚至牵强附会,而应适当地减损、剥离那些桎梏人们心灵的东西。

总之,陆九渊所倡导的“易简”教学法其精义所在,就是主张把“整体明了”和“减担”结合起来。“整体明了”,就是着重于运用反省自思的形式去领悟某种道理;“减担”,就是用领悟到的道理为指导,以简驭繁去净化人生追求,达到崇高的为学和道德境界。应该说,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,注重激发和培养动机、情感以及意志等非智力因素,强调直觉思维在培养道德认知和提高道德判断能力过程中的作用,对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。

陆九渊所倡导的“易简”教学法并不是一种玄虚的工夫,它强调的是要从日常生活出发,这种方法,人人可为,时时可为,处处可为,所以堪称“简易”工夫。明代的吴与弼、陈献章、王阳明、湛若水等许多儒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“易简”教学法。实事求是地说,陆九渊倡导的“易简”教学法意蕴丰富,别具一格,对中国教育史上宋明心学教育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陈青之.(2009).《中国教育史》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顾春.(2003).《来源·争论·特性——陆九渊教育思想三论》.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.
- 刘宗贤.(1997).《陆王心学研究》.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.
- 王守仁.(1992).《王阳明全集卷五·文录二·与幸元山》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.
- 张立文.(1992).《走向心学之路——陆九渊思想的足迹》.北京:中华书局.